

我是警察

WOSHILINGCHA

毛寄萍◎著

阳光下的

每一张笑靥

都能激起

他的无限柔情

柔情似水

他才忠诚地守护着

每一个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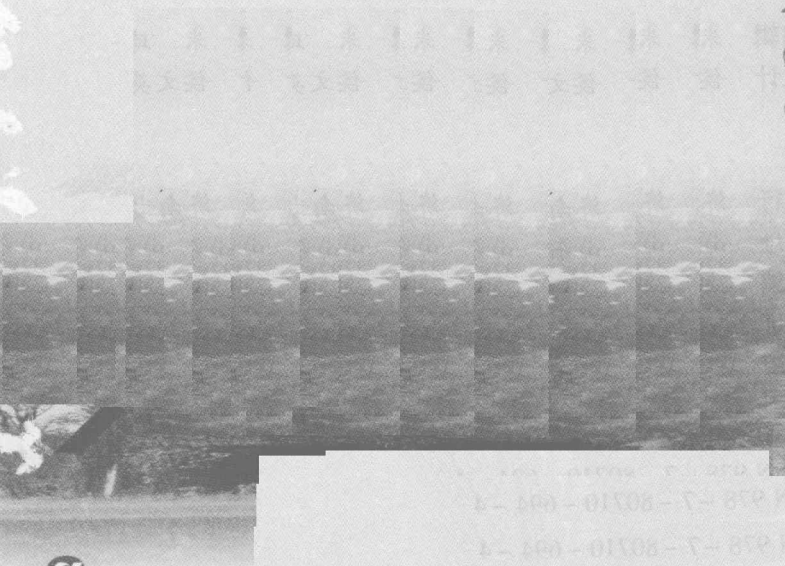


济南出版社

我是警察

WOSHIJINGCHA

毛寄萍◎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警察/毛寄萍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80710 - 694 - 4

I. 我… II. 毛…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363 号

责任编辑 朱 琦

封面设计 侯文英 王 莹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10 - 694 - 4

(济南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目 录

1. 忠诚	(1)
2. 标本	(11)
3. 不是麦加,胜似麦加	(27)
4. 烙印	(52)
5. 吃水不忘挖井人	(72)
6. 瞻前顾后 格外费力	(84)
7. 生存状态	(90)
8. 你们这些私孩子	(135)
9. 孤独	(148)
10. 挫折	(162)
11. 一盎司:一磅	(173)
12. 这世上还真没难住他们的事儿	(188)
13. 敬业	(200)
14. 挺膺负责 躬身入局	(208)
15. 人活一口气	(227)
16. 胸怀	(231)
17. 长袖善舞	(238)
18. 公安局的娘们儿们	(245)
19. 朝花夕拾(一)	(261)
朝花夕拾(二)	(276)
20. 跋	(279)

1. 忠 诚

我是不会变心的
就是不会变
大理石塑成雕像
铜铸成钟
而我这个人
是用忠诚铸成的
即使是破了，碎了
我片片都是忠诚

这是香港诗人何达写给他妻子的一首题为《忠诚》的小诗，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倒不是因为我早熟，而是因为小诗太精彩，它用了那么形象的比喻，表达感情那么真挚，那么强烈，那么坚定所以就那么震撼。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里，遇到如此一首色彩浓郁感情真挚的小诗，真像是沙漠里的一泓清泉，凛冽清新，沁人心脾。

许多年以后，当我不断地采访基层的公安干警，当我面对着一大堆采访来的材料尝试着提炼出一个主题的时候，《忠诚》这首小诗立即就闪现在我的脑海。

其实，从这首小诗问世那天起，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恋人之间的剖腹相示，倾心相许，它把一份忠诚、挚爱到骨子里的感情描述得那么刻骨铭心，那么坚定不移，人们更多的是把它拿来表达一个人对事业、对阶级、对国家的忠贞不贰，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作者用贴切的比喻把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化，恋人之间的生死承诺沟通了人民警察国家对人民对党对法律的无限忠诚。而且，惟其是恋人之间的诉说，这种情感也就更加纯净，更加真挚，更加

忠贞。

只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我已经记不清诗中的每一个字,于是,我就打开了百度的搜索网站,把“忠诚”二字输进去,呼啦啦几千条关于《忠诚》这首小诗、关于忠诚这个单词的资料铺天盖地。

也许,忠诚是个渐渐被人疏离的品德,在许多的条目中,忠诚被强调成一种为人处世的能力,更有甚者,忠诚被解释成一种人情练达的艺术。比如,那本号称10个月印刷17次,被发给每个国家公务员学习的名为《工作中无小事》的小册子就这样解释忠诚,“忠诚是取得领导信任的策略,忠诚是攫取同志好感的工具。”

真是世风日下,忠诚,竟成了策略与工具。

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内有铭文175字,是一篇西周晚期的判词,记载了小吏牧牛违背忠于上司的誓言,被周王重臣伯扬父判决有罪,鞭打一千,削职为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成文判决,而最早的成文判决,就是对不忠的惩罚。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民族何以对忠诚如此重视,反正它是最被看重的品德。它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为它着了底色,汨罗江里的三闾大夫为它做了注脚,风波亭里的岳飞为它铸就了风骨,零丁滩头的文天祥为它凝聚了魂魄。当南湖的涟漪汇入历史的长河,忠诚又有了更新更深刻更无私更积极更高尚的含义。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忠诚渐行渐远,不知什么时候,忠诚在一夜之间变了味儿。这些年来,个人奋斗,个性解放,自我设计,自我实现,马斯洛的理论牢牢盘踞在人们的观念中,个人价值时时挂在人们的口头上。更有人以求真为幌子,追求这理论,那思潮,唯独回避了忠贞,唯独冷落了忠诚。这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首被人引来引去的名为《忠诚》的小诗,更多的却是把“忠诚”置换成“真诚”。

当然,我不是说真诚不好,真诚同样是种美德,社会同样需要

真诚,我只是认为,真诚不如忠诚么斩钉截铁,那么矢志不渝,忠诚不需要任何理由,忠诚不寻找任何借口,不管是行藏用舍,无论处江湖庙堂,它只管水流大海,葵花向阳。

忠诚是一种品德,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生死不渝。穷途末路时也能挂印封金,杀机四伏中也敢千里单骑。生死关头,能毅然做出“不要管我”的决定,关键时刻,能凛然做出舍生取义的抉择。

忠诚是一种精神,屈原投江,苏武牧羊。叶落归根,狐死首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甘情愿地默默无闻,毫无功利地无私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瞿秋白忠诚,所以,这个体弱多病的羸弱书生能面对行刑的枪口,细心地找一块草坪席地而坐,淡然地对刽子手们说,此地最好。读读他《多余的话》吧,体验了他当时的心境,知道了他当时的处境,再来瞻仰他的视死如归,再来回味他的从容不迫,你就更能体会到忠诚的力量。

忠诚是一种动力,上刀山下火海,闯龙潭向虎穴,攻城不畏艰,攻书不怕难。虽弱,也敢碰硬,是卵,也敢击石。三千越甲可吞吴,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进喜忠诚,所以,他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

忠诚是一种信念,宁死不屈,百折不挠,落魄不失志向,穷困不改初衷。居陋巷不改乐,虽九死犹未悔。

忠诚是一种把生命交给信仰的坚定,是一种宗教般献身的热忱,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义凛然,是韩英砍头只当风吹帽,笑洒热血心欢畅的豪情激荡。

在我有了相当的阅历以后,再来体味这首小诗,再来领略忠诚的含义,更是咀嚼出了特别的味道。

我所接触的这些基层的公安干警,不管他们性格如何,脾气怎

样,不管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甚至,不管他们的性格中有着怎样的缺陷,可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公安事业的忠诚,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生命底蕴。

有了这个底蕴,不管生活给予他们怎样的坎坷,不管命运给予他们怎样的遭际,他们始终痴心不改,忠贞不贰。

主题提炼出来了,可又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同样生活在大千世界中,忠诚这种底蕴是怎么形成的?忠诚这种品质是怎样铸就的?是建立在对我们党伟大事业的深刻理解上,还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性格秉性中的那些善良美好的天性恰恰与美好的共产主义精神暗合?抑或仅仅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

在我的经验里,有许多的人,他们好像不应该有那么坚定的信念,不应该有那么纯粹的忠诚,他们本应该怨气在腹,块垒郁胸,他们本该对自己的遭逢耿耿于怀,他们本该对自己的际遇闷闷不平。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对党的事业依然是那么忠诚,忠诚到让人不能理解的程度。

实际上,最早引发我对忠诚思考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一生坎坷,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他一生不被信任(当然,这是拜极左路线所赐),尽管,动辄得咎是他一生的写照,可他依然赎罪般地过完了他的一生。然而,不管他怎样地在工作中努力,不管他怎样以实际行动向组织剖白他的心迹,不管他怎样地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地来赎自己的罪,但全都无济于事。每次政治运动,他都要经受一次冲击,都要接受一次审查,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冲击更是空前绝后。而每一次审查,每一次冲击带给他的,永远只是深刻的反省,和反省之后的更加努力地赎罪般的思想改造。

其实,他也知道他的尴尬,他也有过牢骚,但更多的,却是不被

信任的苦闷：

——投身革命的举动被质疑：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舍弃舒适的生活到抗日队伍中吃苦，分明是到革命队伍中来卧底。

——他的每一次赎罪般的举动都被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骗取组织信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宁愿自己饿着肚子把粮票送给生活困难的同事，被说成是用小恩小惠拉拢革命群众。

父亲性格隐忍，他是怎样度过他的一生的我不得而知，可我曾看到过他在日记本上写过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让我体验到他海一样的孤独和沉重：“人人都说我偶然，我说众人不偶然，世上自有偶然事，哪有偶然复偶然。”

父亲做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他的文笔很好，我登在报上的文章他都能给我指出哪儿还应该再细，哪儿根本是赘笔，哪儿说理不够，哪儿写得还不错。虽然，我的那些文章报社的编辑们都已经过了好几遍筛子，可我得承认，父亲的意见全都是些切中肯綮的真知灼见。虽然如此，可是他却从不动笔。他一方面把他能见到的我所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精心地剪贴，收藏，（尽管我告诉他，编辑部每篇文章都给我寄了样报，可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把它剪下来）一方面又不断地劝我，别写了。他在北京的一个老战友看到《报刊文摘》上转载的我发在《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上的一篇文章之后，立刻把报纸给他寄了来，还写了许多欢欣鼓舞的话。我能看出父亲的高兴和欣慰，可高兴过了，欣慰过了，他还是劝我说，别写了。只是，父亲低估了我的理解能力，他劝我别再写的理由是写东西对眼睛不好。其实我知道，父亲怕的是文字狱，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家庭不担在乎儿。

一方面他对儿子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方面又担心我写文章写出什么事儿来，这种担心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许

多年还那么强烈,由此可见,过往的历史、极左的路线在他心中造成的伤害之重、之深。

我是父亲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因为父亲的缘故,无论是上学还是当兵,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世,都受到了他的严重的致命的影响,因此,我知道,在父亲的内心深处,除了浓浓的父子深情外,还一直对我心存歉疚,觉得是他连累了我,所以,父亲对我特别好,特别容忍,从来不对我发火。可唯一的一次,他却对我发火了。关于这次发火,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感谢《人民公安报》的编辑把它登出来,让它得见天日,我把它记录如下:

父亲去世两年多了,我曾是那么强烈地渴望梦到父亲却一次也梦不到,我因此感到十分困惑。我自以为我与父亲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的父子,在我的眼里,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是我精神上的导师,是我直着脊梁做人的榜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父亲把我领进党的门。

32岁以前,我从没想过要加入共产党。所以不想加入,源于那个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揪出来,而我也跟着成了可教子女。可我怎么也不明白我怎么会是可教子女,我可是一直以当然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的呀。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清明节,我们学校去烈士陵园扫墓,天忽然下起了大雨,其他中队的同学都高举着队旗在雨中冲啊杀呀地奔跑着,可我却把队旗从竹竿上摘下来,仔细地叠好,小心地塞进衬衣里贴肉的地方。我知道,队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因而,我要用生命来保护它。虔诚如斯,却成了可教子女。而且,谁真正拿我当可教子女呢?不论什么人,只要他高兴,就可以骂我,唾我,作践我,叫我狗崽子。在人们的歧视中,我渐渐长大了。

让我更加感到羞辱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看到过他挨斗,低头弯腰站在一群愤怒的革命群众中间被人推来搡去,刺目的大牌子沉

沉地挂在他的脖子上。我那时还小，我不懂这悲剧深刻的原因，就把账隐隐约约地记在了社会的头上，并因此影响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从那，我从没动过要入党的心思。

许多年以后的一天，我跟父亲闲聊，我说起共产党怎样怎样，父亲很不高兴地批评我不该用如此轻慢的语气谈论我们党。当时不知怎么我顺口溜出了一句对党非常不尊重的话。没想一句话，从不发火的父亲居然勃然大怒，好像我亵渎了他心底一件非常圣洁的珍藏。暴怒的父亲说了些什么如今我已忘了，可父亲激烈的态度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一生坎坷，因为历史问题，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少不了折腾他，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本应对党充满了怨怼，可他却像眼里不揉沙子一样地不允许有人发共产党的牢骚，即便这个人是他的儿子，而且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小小年纪就吃了不少苦的儿子。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

其实，文章被我稍稍地艺术了一下，被父亲“骂”过以后，我困惑极了，也糊涂极了，我觉得我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父亲对共产党的那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忠诚，以最最强势的刺激锐利地穿透了我的心。开始，我甚至还悲天悯人地以为父亲是无可救药的“愚忠”。之后，父亲有意识地跟我进行几次长谈，说我们家的家史，说他一生的遭际。每一次，父亲说的全是些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对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假大空的我来说，根本就到不了脑子里。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大道理，其实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实境界，他们那一辈老共产党人，真的就活在这些大道理的境界中，那些大道理真的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是溶化在他们血液里的东西。父亲对我的那些说教，绝对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因为那是父子之间的、不需要矫饰，不需要矫情的谈话。也就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些大道理在父亲的嘴里说出来，一点儿也不虚泛，不空洞，不矫饰，有着一一种穿透心灵的作

用。第二天，我写了入党申请，第二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以前，我最喜欢说的，是《茶馆》里王利发那悲凉的天问：我爱国家，可是，国家爱我吗？

从那以后，我常常想的，是伤痕文学中常出现的那句话，母亲冤枉了我们，可她还是母亲呀！

父亲去世后，我在父亲的墓碑上镌刻下这样一副挽联：

一生坎坷，劫波渡尽，虽不知毛将焉附，却始终玉壶冰心，此情唯苍天可鉴。

仁慈宽厚，以德报怨，纵然是冯唐无望，最要紧不屈不移，家风当世代相传。

这副挽联，真的毫不夸张，父亲就是那样看起来有些“傻”地“迂”地“不可救药”地“不可理喻”地以他的一生演绎着一段忠诚。父亲的原名叫毛国梁，这是他的父亲对他的一种希望。父亲从小就有国家栋梁的志向，可当他扛着铺盖卷揣着一腔热情从胶东半岛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出来，苦苦地寻找着能成为国家栋梁的途径和机会的时候，旧中国给他的，却永远只是失望和绝望，让他产生了一种不知所依无所寄托的迷茫和困惑。我想，他后来给自己改的毛焉附的名字，就形象地代表了他对那个政府和时代的失望，代表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和彷徨。当他终于在1940年找到了共产党的时候，他的热情才那么持久地迸发，他才那么执著，那么无怨无悔地仰止，行止，忠诚止，追随之。

有时候，我甚至会这样毫无觉悟地想，不为别的，即便是为了父亲对共产党的这份忠诚，我也应该在共产主义这条道儿上走到底。

我知道，我采访的这些公安干警，他们肯定没有我父亲的经历，没有我父亲受的那些磨难，但对于共产党的忠诚，却毫无二致。

我的又一个问题，是父亲他们那一辈子目睹了旧中国的凋敝和民不聊生，经历了落后挨打和列强蹂躏的苦难，明白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所以,他们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忠于共产党和共产党的事业。可这些年轻的干警们,他们的这种忠诚是怎么来的?这些一生下来就在红旗的庇护下的一辈一辈的人,有多少人能保持这样的忠诚?这种忠诚能传多久?

我常想,面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变幻,毛主席为什么总要反复讲述“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为什么总要反复强调“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反复告诫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警惕和平演变。他是在担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能否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在牵挂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高擎着火炬走进他们心驰神往为之殊死奋斗的大同世界?心事浩茫,思接千载,经历了刘青山张子善和九·一三变故的毛泽东和周总理他们那辈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们能放心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也跟陆放翁一样有着同样的情结,同样的牵挂,只不过,他们的挂念,要深沉得多,伟大得多。

而且,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文情怀,一种勇于担当的光荣传统。这种人文情怀,这种光荣传统,实际上就是对祖国对民族无限忠诚的一种体现。在我的脑海里,总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场景,1998年的一个秋夜,繁星点点,秋虫唧唧,在漳卫河畔一个校园里,我跟我的入党介绍人赵群在一起谈东欧巨变,谈西风东渐,谈我们对国际共运的看法,谈我们对祖国命运的看法。

那一夜,我们俩值夜班,因而,有的是时间让我们聊。等东方露出鱼肚白,当一阵困意袭来,我们得出了共识,命运已经把我们的跟共产党联系了起来,忠诚党的事业,应该就是我们的宿命。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全都别无选择。

这个场面之所以清晰,是因为我觉得,在人欲横流的商品时代,我们却真心地在为祖国的前途操心费神汲汲忧患。这让我甚

至有些自恋。

这个场面之所以清晰,还因为就是在那个秋夜,我好像突然受到了一种点化,宿命这个带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准确地定义了我跟共产党的关系和感情。后来,当我到了报社,就是这种感情激励着我,让我有了“敢遣春温上笔端”的勇气,而当我采访一个个警察兄弟,当我为他们做文立传,我也总会在他们的感情世界中发现这些情愫,产生一种共鸣。

我特别想把这种情愫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一群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警察。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那些警察们,翻检他们的心灵深处,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见识他们的学识修养,领略他们的性格气质,看看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追求与困惑,解脱与超越。

2. 标 本

我之所以把赵君独立成章，甚至想在结构上把此章节作为楔子，就是因为赵君这个人的标本意义。从一个只想着个人出人头地到自觉地为一种事业奋斗，这是一种升华。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着那样坚定的信仰，那么执著的奉献精神，是党的教育，是这个光荣的集体使他们有了志向，把自己变成了大写的人。

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一个人，是武城县公安局的局长赵君。

赵君是个很低调的人，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我则是个很执拗的人，只要我想完成的采访，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阻力，我都不会罢手。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次跨越了五个年头的采访。

对赵君的采访，是一次“显失公平”的过程，五年里，我像耍小钱儿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他做刑警队长时，我跑刑警队，他调到县里当局长，我又跟着往县里跑。我一次次地约，他一次次地爽，断断续续，离离拉拉，即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对他的采访是不是真正完成了。

记得第一次的话题是从他小时候说起的。他这样跟我说起他的小时候。

我从小爱画画儿。可能是因为天赋吧，一块儿学画画儿的小朋友，属我画得好。那时我父亲是市委招待所的所长，招待所坐落在新湖旁边，新湖是德州市最美的景观，水面虽然不大，但浓缩的全是精华，烟波浩渺，柳枝依依，风情旖旎，恍若江南。因为父亲的关系，我有“特权”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楼顶上面对着波光荡漾的湖水，面对着春雨潇潇冬雾弥漫中的烟柳，尽情地挥洒着我的笔墨。也许还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我画得

真的特别好的原因,经常有人摸着我的头说,画得真不错,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将来有大出息、大作为”之类的话每天不绝于耳,逐渐积淀在我的脑子里,最终成为一种强势,并潜移默化,以至一度成为我人生的一种目标。

如果生活按着原来的样子发展的话,我一定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画家,真的,我喜欢画画儿,而且画得也不错,我想当个画家,我肯定能当上画家。可生活并不总是按着人们的意志发展,变故是1976年。

1976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灾难,我的生活道路也在那一年发生了转折。是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哭得那么伤心。也许是全国人民的眼泪太多了吧,泪飞顿作倾盆雨,开追悼会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父亲在追悼会上淋了雨,患了重感冒。那个时候,人们的心气跟现在可不一样,全都憋着化悲痛为力量,父亲虽然高烧不止,但他却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而且还把自己患重感冒的事儿捂得严严的,连家里都不说,不几天就顶不住,去世了。应该说,父亲是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一年,我14岁。

父亲一去世,家里的生活立即陷入困顿,所里的领导照顾我们,让我顶替父亲进了招待所。由一个沉溺在画画世界里的神童,忽然变成了一个童工,虽然我年纪还小,但这个反差已经让我对生活措手不及了。

在招待所,我做过厨师,当过登记员,可不管做什么,不管工作多么累,我总也忘不了画画儿,这不光是爱好,在招待所里作画对我来说还有着另一层意义。每当我累了一天,坐在宿舍,拿着画夹临窗作画时,我就会感到父亲站在我旁边,温暖地抚摸着我的头,慈爱地看着我。他虽然不说什么“出息”“作为”之类的话,可从他那般切的目光里,我仍然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期望。

窗前作画,成了我跟冥冥世界中的父亲的精神联系。遗憾的

是，父亲虽然爱我，对我寄予希望，可父亲去世时我还小，他还不能从朋友的意义上、大人的角度上和我交流，因此，我还不知道他对我“出息”要求的具体内容，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理解来想像、替代、置换父亲对我的“出息”的要求——那就是出人头地。

父亲一生待人热诚，所以朋友特别多，他们每年都要到我家来看望，看有没有什么困难。在我20岁那年，公安局的曲局长到我们家来，临走时对母亲说，让孩子到公安局来吧。

到公安局报道那天，曲局长问我，小子，想干什么？我说想去刑警队。曲局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有志气，肯定能出息。这一拍，就把我拍到了刑警队。

又是一个“能出息”。殊不知，这个时候，在我的意识里，“有出息”已经不再只是别人对我的一种客套的称赞，而是我思想中的一种自觉，人生中的一种使命，生命中的一种追求，是我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种承诺。

到刑警队办的第一个案子是廿里堡乡的一起纵火案，我和我的师傅一块儿在现场呆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我和师傅不是在现场勘察，就是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雪四乡八村地搞外围调查，我因此觉得心情灰灰的。我倒不是怕累个贼死，主要是我对刑警这个活儿还没有什么认识。每天骑着车子这么瞎转，逮着一个老百姓就问人家那天你到哪里去了，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没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难道人生就这么打发吗？

而且，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不能作画儿。因为我说过，画画儿已经成了我跟父亲精神上的一种联系，一种交流，越是不能画，就越想父亲，越想父亲，就越觉得这么一天天骑着自行车乱转悠没意义，甚至是浪费生命。总这样，我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什么时候才能出息，什么时候能实现我对父亲的承诺呢？

那年的雪真不少，那天，天上又飘起了鹅毛似的雪片，不能出门儿，我就跟师傅在屋里闲聊。虽然聊的是家常话儿，可家常话里